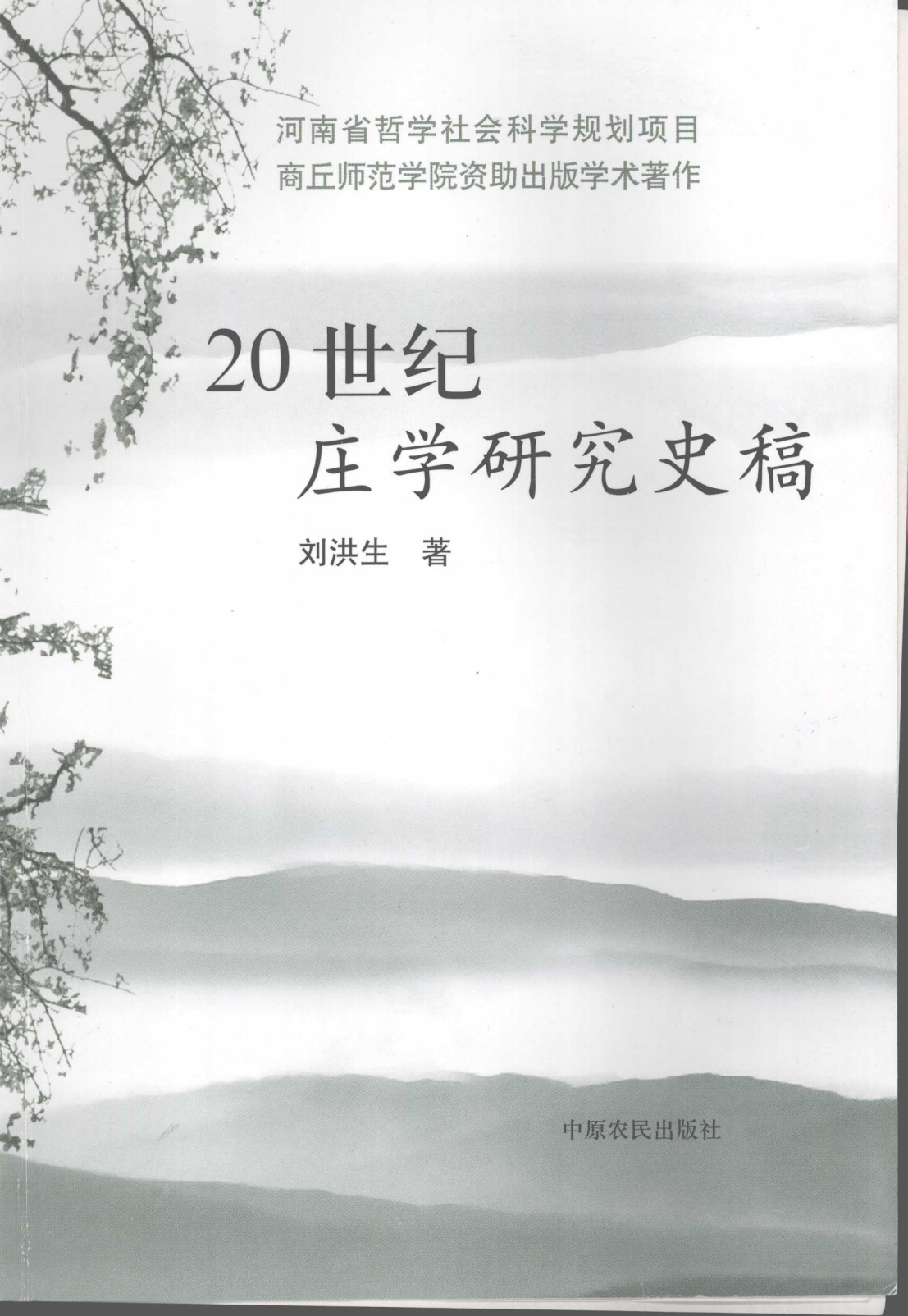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商丘师范学院资助出版学术著作

20 世纪 庄学研究史稿

刘洪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商丘师范学院资助出版学术著作

20 世纪

庄学研究史稿

刘洪生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庄学研究史稿/刘洪生著.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80739 - 087 - 9

I. 2... II. 刘... III. ①道家—研究②庄子—研究
IV. B223.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961 号

出版社: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0mm × 1240mm A5

印张:14 **字数:**430 千字

版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739 - 087 - 9 **定价:**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言

梁启超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①,强调了学术研究引领时代精神的价值。其实,这句话也有着反向推演之意,那就是: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政治与世风必然孕育着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②。

回首远逝的20世纪百年,社会的发展风云变幻,往复曲折。半封建、半殖民化的中国也从贫穷、落后、封闭走向了独立自主,走向了觉醒、复兴和强大。其间,有昂扬奋进的高歌,有慷慨悲凉的战斗,也有荒诞滑稽的舞演。一代代知识分子就在时代的浪潮中思索、探寻、沉沦和耕耘,他们推动着学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被学术和社会推动着。

具体到庄学研究的问题,百年中,随着传统文化的积累,随着西学的东渐,无数学者以他们自己对庄子及其著作、学说的理解和认识、认定及评价,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认真的追寻。这些研究有传统的义理考据,也有外来思想的碰撞;或偏重文献,或偏重思想;或是局部的研究,或是整体的通观;或是学术专著,或是单篇论文;或是汉文化下的本土研究,或是来自海外和异族的关注;或家传师承,或自发探索;或个体独创,或集团结社;等等。这些研究,一方面,推动了庄学事业的发展,在庄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正确独到的论断,也有顾此失彼的不当评说;既有发人深思的卓见,也有阐释过度的误读和执其一端的认识。因而,对那些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行“史”的盘点和观照,实事求是地评介,科学地分析,正确地论定,总结经验,寻找不足,让后学者了解一代

① 见《清代学术概论》。

② 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学术的发展脉络与走向,免去一些暗中的摸索,使庄学在推陈出新中继续往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意义上,笔者不揣鄙陋,撰写了《20 世纪庄学研究史稿》一书。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上编、下编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 20 世纪初庄学研究的背景等问题。20 世纪初,庄学的研究是在子学复兴的背景下展开的。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国势日蹙,学者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下,不仅要改造社会,还要更张学术,一时从先民文化本身中寻求可以对抗西学冲击的因素,成为一时之尚。以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的子学研究可以说是应社会现实与更新学术的双重需要而起,在他们的提倡下,诸子之学风靡一时。

上编部分,叙述 20 世纪前半叶的庄学研究。共八章,分别论述了:章太炎《齐物论释》的“以佛解庄”;罗根泽《诸子考索》关于庄子后学流派的划分及《庄子》内、外、杂各篇真伪和归属的考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关于庄子的“进化论”释和五四时期对庄子“东方懒惰圣人”、“守旧党的祖师”的批判;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关于庄子的“泛神论”思想和抗战时期对庄子的激烈批判;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及《庄子义疏》中关于庄子生平与文学成就的考论;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对庄子及《庄子》各篇的考证和阐发庄子哲学的“人生四境界”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等几家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从文学艺术角度对《庄子》进行了阐释。这些学者中大多有着留洋的功底,又有着极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因而,在诠释传统时仍然能够保持对象的完整性,并没有因视角的转换而导致对象的变形。他们通过古今对比和中外对比的总结,促进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赋庄学以现代意义。

下编部分,叙述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庄学研究。共四章。

第一章,峥嵘岁月下的学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大陆庄学,包括关锋的《庄子哲学批判》和冯友兰、任继愈等人的庄子哲学研究,共两节。回望那些研究,有激烈的争鸣,也有激进的放言;有科学的

分析,也有全盘的否定;有经典的学术,也有速朽的垃圾;是赤色的洪荒,也是怪异的繁华;峰尖浪谷暗转,悲喜歌哭交融。

第二章,柳暗花明后的霏霏炊烟:新时期大陆庄学,包括张恒寿的《庄子新探》、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思想、刘绍瑾的《庄子》美学、阮忠的《庄子创作论》、颜世安的《庄子评传》、张默生的《庄子新释》、黄正雨的《庄子简论》、20世纪90年代几篇关于《庄子》的博士论文、新时期哲学《庄子》研究的若干论文、新时期文学《庄子》研究的若干论文、道家思想比较研究下的庄学问题、历届全国庄子研讨会对庄学研究的贡献等,共十三节。改革开放后,大陆庄学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走向正途,迎来了春天。学术的探讨,在相对自由的气氛下进行,少了许多异样的干扰。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多种风格、多种领域的庄学研究,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方面,都成果斐然。

第三章,冰心玉壶与烛光桨影:港台庄学研究,包括港台《庄子》文学研究、陈鼓应和他的庄子哲学研究、港台其他人的庄学研究,共三节。20世纪后半叶,港台一大批学子漂泊海岛,偏安一隅,无论政治的云烟如何,以他们冰心玉壶般的学术良愿,在烛光桨影中从事着庄学研究。他们的庄学,有着自己区域的特点,与大陆庄学在有限的交流下,遥相呼应,共同推进了庄学的本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由于港台延续着对传统文化的因袭,同时又借助西方文化的风力,一些人的一些研究成果甚至为大陆所不及。

第四章,多元文化下的对语:海外庄学研究,包括《庄子》在海外的译本、英语世界的庄学、海外庄学研究现象浅析,共三节。《易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世界文明史就是不同种族之间交往与融合的历史。不同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潮不断地交流、渗透、融合和印证,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各种思想和学说,越是深刻、本质,就越是趋向于相互接近。经典的思想 and 学说之间都有着暗通的精髓和可比的价质,它不仅属于一个民族,更属于全人类。产生于中国两千年前的庄子哲学,以它蕴涵的深刻智慧、独特的思想者的姿态和绝妙的言说方式,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以寻求个体生存之安身立命的价值为指向,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齐物”),成

为照亮现实世界的理性烛光,也成为世界人民的思想资源。当然,对脱离了本土文化的庄子思想,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但无可否认,他们的研究也反过来推动了汉文化中庄学的本土研究。

孟子云:“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间者难为言。”笔者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常在一些学者博大精深的卓论面前错愕惊慌,难以措辞,唯恐落于言筌,所能做的常常只有“述而不论”。因此,书中评介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时,可能占用了过长的篇幅和过多的笔墨,甚至引用一些原文,诚是笔者对所论深以为是,难以捐弃之因,实无他念,敬请原谅!然学海茫茫,渺无涯际,仅就20世纪百年的庄学而言,也是浩如烟海,头绪纷繁。写作本书时,哪些写,哪些不写;哪些多写,哪些少写,在取舍方面是颇费思量的事,笔者这里仅是“撮其要者”,即抓住那些能代表一个方面、一种类型、一种风格、一个时代的研究者,“颌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见一斑。”^①自觉所著挂一漏万之憾必有,错讹之处难免。庄子寓言有海神教训河伯说:“井蛙不可以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者,束于教也。”^②因而,诚恳地说,笔者热切盼望更高水平的此类著作问世,以便广视听而就教!

经典是开放的思想系统,只有靠专家的解释,我们才能体会到经典伟大的思想力量。中国古典思想传统是经典被解释的传统。对经典完全不理睬前人解释的阅读,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不可取的,越是后来的解释者或阅读者越是需要阅读前人的解释,这也是克服文化沉积所造成的障碍的需要。因此,崔宜明先生认为:“哲学史是一部理性的对话历史,是一部永无终结的对传统的现代阐释史。”^③另一方面,解释总会不同程度地为元典增添内容,每个时代、每个人都会按自己的标准去领会经典的意义。每一个说庄者,都自认为是真解庄者,但就庄子本身的思想而言,随着庄子的弃世,它已经终结,那么,每一个人的庄论,很可能仅是“异化”的自论,掺入了研究者自己的人生哲学,

① 见韦庄《又玄集》序。

② 见《庄子·秋水》。

③ 见《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

是庄子之外的另一种著述而已。因而有人质疑庄学的研究,要求“还我庄子”!但敢问质疑者:“你的庄子就真的是庄子吗?”这种问和答恐怕只是“吊诡”之谈。事实上,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无论历史上的庄子究竟写了《庄子》的哪些篇章,版本的流传过程如何,都不妨碍庄子哲学之为庄子哲学,它已通过《庄子》一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仍在继续着。研究经典不是要拒绝哲学,而是要更新哲学的视野。因而,知识考古学就是要在一个传统中发掘不同层次的思想堆积,正视异质的现象,即使不能肯定何者是正确的解释,也可以比较出更好的解释。这里,可以借用崔大华先生的观点:有些学术问题,有时候不是历史本身的问题,而是后代学者在研究中产生的问题。而研究历史时产生的问题,有时会比历史本身存在的问题麻烦得多,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必要的;“历史沿着事实的时间环节前进,而研究历史必须解开事实的逻辑环节才能前进,这必然要引用历史本身以外的东西来加以说明和证实”^①。这或许正是庄学研究和再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其中的甘苦,正如陈少明先生所言:“阅读《庄子》,如同享受精神的盛餐。但研究《庄子》,则几乎是拣了一块难啃的骨头。所以一番费劲的功夫之后,肉没吃到,尝到的只有一点味道。”^②

真正的哲学是动态流变的层叠的真理,是思想的“来风地带”,而不是僵死不化的教条。它随时处在兼容一切时代意识和思潮的态势之下,无论世移时转,还是沧海桑田,它都能够让人作出多重的解读,而且历久弥新。至少庄子的学说,拥有着这样的优势。它以对自由的热烈向往(逍遥)、对平等的积极追求(齐物)、反抗强权的自觉意识(无为)、执著的求真品格(自然)等,使它具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科学思维的方式、宗教般悲悯的情怀。因此,庄子的哲学关心的是一种很大的东西——“道”,有着很高的“教养”,这种“教养”不仅是对人、有情的世界充满同情,而且对物、无情的世界也充满欣赏,从根本上远离了功利主义。只不过,在表达方式上,庄子的学说惯于使用一种“正言若反”的诗意的言说和故作游戏的人生姿态,显得玄远深奥,“意出尘

① 见崔大华《庄学研究》。

② 见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

外,怪生笔端”^①,但这更赋予了它持久的魅力,让人着迷沉醉,流连忘返。

展望再一个百年,不知人类究竟会向何处走去,也不知庄学研究会发生些什么变化,但我们真诚地期待着这种学说能够推陈出新。

^① 见刘熙载《艺概·文概》。

目 录

绪 论

- 一、庄学研究的背景:子学复兴/1
- 二、20 世纪子学研究状况概述/3
- 三、20 世纪庄学研究的新视点/8

上 编

第一章 20 世纪前半叶庄学研究概况/20

- 第一节 出版的庄学专著/20
- 第二节 发表的庄学论文/30

第二章 章炳麟的庄学研究/33

- 第一节 章炳麟及其《齐物论释》/33
- 第二节 《齐物论释》的写作背景/35
- 第三节 《齐物论释》以佛释庄、以庄印佛的特色/36
- 第四节 《齐物论释》以自然科学知识解释庄学的特色/41
- 第五节 《齐物论释》的局限性/42

第三章 罗根泽谈《庄子》诸篇真伪源流/44

- 第一节 罗根泽的生平与创作/44
- 第二节 《〈庄子〉外、杂篇探源》的研究旨趣/45
- 第三节 《〈庄子〉外、杂篇探源》的主要观点/45

第四章 胡适的庄子研究/57

- 第一节 胡适的生平与创作/57
- 第二节 关于《庄子》的作者与诸篇真伪/57
- 第三节 关于庄子哲学的论述/59

第五章 郭沫若的庄子研究/62

第一节 郭沫若的生平与创作/62

第二节 五四运动时期以庄子为中介接受西方泛神论思想/63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对庄子思想的肯定与批判/65

第六章 闻一多的庄子研究/69

第一节 闻一多的生平与创作/69

第二节 关于庄子生平的叙述/69

第三节 关于《庄子》一书的论述/72

第四节 关于庄子文学成就的评述/75

第七章 冯友兰的庄子研究/76

第一节 冯友兰的生平与创作/76

第二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庄学研究/77

第三节 20 世纪 40 年代的庄学研究/81

第八章 几家《中国文学史》对庄子及其学说的评介/85

第一节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85

第二节 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86

第三节 陈柱的《中国散文史》/87

第四节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89

第五节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诸子》/91

第六节 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92

下 编

第一章 峥嵘岁月下的学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大陆庄学/99

第一节 关锋的庄学创作/99

第二节 冯友兰、任继愈等人的庄学研究/121

第二章 柳暗花明后的霭霭炊烟:新时期大陆庄学/157

第一节 张恒寿的《庄子新探》/157

第二节 刘笑敢的庄学研究/163

第三节 崔大华对《庄子》的“歧解”与研究/169

第四节 刘绍瑾的《庄子》美学研究/194

第五节 阮忠的《庄子创作论》/237

第六节	颜世安的《庄子评传》/241
第七节	张默生的遗著《庄子新释》/270
第八节	黄正雨的《庄学简论》/278
第九节	现代阐释学下的庄子:新时期庄学研究的几篇博士论文/289
第十节	新时期《庄子》哲学研究的若干论文/297
第十一节	新时期《庄子》文学研究的若干论文/315
第十二节	道家思想比较研究下的庄学问题/327
第十三节	历届庄子研讨会对庄学研究的贡献/336
第三章	冰心玉壶与烛光桨影:港台庄学研究/344
第一节	港台《庄子》文学研究/344
第二节	陈鼓应和他的《庄子》哲学研究/348
第三节	港台其他学人的庄学研究/357
第四章	多元文化下的对语:海外庄学研究/364
第一节	《庄子》的海外译本/365
第二节	英语世界的庄学/369
第三节	海外庄学研究现象浅析/385
附录	20世纪庄学研究部分资料索引/389
	庄子学术论文/389
	学术著作/428
	后记/435

绪 论

一、庄学研究的背景：子学复兴

关于子学研究的问题，张梅博士纵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直到清朝中叶，对诸子的研究是很不平衡的，儒、道两家之外的各家学说受到了长期的冷落。学者们对诸子的关注是伴随着清代考据学的深入发展而来的，因为就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就是诸子了。汪中作《荀卿子年表》，校订墨子；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管子》、《晏子》、《墨子》、《荀子》诸书，摆脱正统儒学的偏见，开了子书研究之先河。不过，这时的研究还停留在将其与经书研究参考互证的层面之上，因为诸子书多载《诗》、《书》旧文，可以印证儒家经义。虽然如此，但在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考据大家的带动下，对子书日益深入的整理，最终必然会突破这一初衷的园囿，导致对诸子思想的再发现。”^①

到了晚清，在时局动荡及西学的冲击和影响下，考据学自身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经世之学重新受到重视。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依据的《孔子改制考》实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并且“导人以比较的研究”^②。曾师从于俞樾的章太炎，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致力于诸子学的研究。从早年的《膏兰室札记》（写于1891—1894年间，收入《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到全面发挥他“尊子贬孔”观点的《诸子学略说》（即《论诸子学》，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日本秀

① 见张燕瑾、吕薇芬《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光社 1906 年 9 月版;同年更为此名,在《国粹学报》第 8、9 号上连载),章氏通过诸子学的研究来突破儒家传统之束缚,引导人们走向现实革命的积极用世倾向越来越鲜明,体现了他深刻的政治寓意。

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国势日蹙,不仅要改造社会,还要更新学术,而且只有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具有实效的学术,才会被社会承认并得到发展。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着力突破康有为、谭嗣同所未能突破的“纪孔”,而另一位致力于子学研究的学者梁启超,则企图通过古今对比和中外对比的总结,促进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进而推动民族国家的觉醒与复兴。

在旧式学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下,从先民文化本身中寻求可以对抗西学冲击的因素,成为一时之尚。如:老子之道与斯宾塞、达尔文相通(严复《侯官严氏〈老子〉》,东京发行,1905 年版);社会主义大同的构想孟子那里早就有过,老庄书中多有卢梭的“民约”思想(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老子案语》,上海镜今书局 1904 年版);庄子是自由主义的始祖(严复《庄子评点》,1916 年手批朱墨评点手稿本,收入《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章太炎《齐物论释》亦有类似看法);声光电话之学早在墨子就已是精通了;等等。诸子学的复兴,不能不说与这种出于复杂的民族自信心的寻绎比附有一定关系。在这样的风气中,梁启超的思考无疑有着深层次的用意。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载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 7 号)、《先秦政治思想史》(载于《晨报》副刊 1922 年)等著作中,指出当代学人应从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总体中汲取精华,加以改造后为我所用,并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想从此找出复兴民族国家的契机。

在治学方法上,由于清代学术内在的分裂和西学的影响,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章太炎是第一位从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各方面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深入分析的学者。他的子学研究超脱了校勘训诂的传统形式,在贯通的基础之上又创建了一种有条理而系统的诸子学。而且,他在推崇乾嘉考据的严谨朴实作风的同时,也比较注意吸取西方近代的思想与方法。《齐物论释》(载于《国粹学报》1910 年)便是为了阐释自己的“唯识论”体系,而将康德之“批判哲学”纳入庄子哲学,并“与瑜伽、华严相会”的产物。他是近代第一位以佛理及西学阐

发诸子学的学者,创获之大,自不待言。梁启超的子学研究则注意以发展的眼光分析各学派,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讨论其哲学、政治、经济思想,并注意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思想相比较。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中对儒、墨、道、法四家思想的归纳,对各家之间相互影响与吸收的关系的认识,对后来的子学研究均有启发。当然,他们对西学的吸收还很不成熟,进化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而且往往有很牵强的比附,但他们试图沟通中西文化与进行思想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都是具有启发性的。

章太炎、梁启超的子学研究可以说是应社会现实与更新学术的双重需要而起。在他们的提倡下,诸子之学风靡一时。

二、20 世纪子学研究状况概述

在五四时期的学者中,受到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深刻影响的胡适,特别注意乾嘉考据和科学方法的结合。他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始了他的子学研究。他认为哲学的发展取决于逻辑方法的发展,而先秦时期每一学派都有其独特的名学方法。诸子对验证方法的重视,与西方科学精神有相通的契机,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与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1917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已经开始这种尝试,其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19 年版)的问世,进一步以对逻辑方法的清理为基础,总结了先秦哲学史的主构。其具体途径仍是汉学家的,即考订诸子年代,辨别各书真伪。不过胡适并非为考据而考据,而是希望通过甄别,能够清理出先秦学术递次演进的脉络。虽然逻辑史并不能涵盖哲学史的全部,但这种全新的治学角度与实证的治学方法的结合,正能与五四时期的学术界突破旧学的传统形式,建立全新学术典范的内在需求相契合。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把诸子学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要考其哲学,不可不先考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及背景。哲学界对先秦诸子的重视,也推动了考证之风在子学研究领域的盛行。在清代中叶以来的疑古风潮、章太炎的尊子贬孔、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

史研究、胡适的提倡科学方法等的多元影响下,20 世纪 20 年代崛起的引发史学界革命的“古史辨”派,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诸子的起源、各学派学术源流的关系、诸子的生卒游历及其书的真伪、《墨经》的校释、老子的年代问题等,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中心议题。由罗根泽主编的《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集中了这方面的成绩(第四册 1933 年由北平朴社出版,第六册 1938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诸子的起源与学术流变是关系到诸子学说之根据的重要问题,对它的讨论是由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引起的。针对章太炎之说,胡适在 1917 年 10 月 15 日出版的《太平洋》上发表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张诸子之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他经过论证,指出“古之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若谓九流皆出于王官,则成周小吏之圣知,定远过于孔丘、墨翟”。应该说胡适的驳斥是比较有力的,在他以后,这个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不过反对者提不出更有力的理由,诸子之学术渊源不能单纯地以是否出于王官来衡量,这些也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针对这个问题,在日益深入的探讨中,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梁启超 1926 年发表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认为,“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目录学利便”,后来的学者,或赞成或反对,皆推挹太过。至于学术渊源,他和冯友兰等人的看法相似,既看到了学术的历史继承,又看到了社会现实的因素对诸子学派一时并起的促成作用。钱穆尤其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

在考论诸子年世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无疑当属钱穆。他治子学的最大特点是把诸子学当做一个有序的整体来研究,对先秦诸子的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加以辨伪与考订,进而梳理各学派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12 月版)中,钱穆整理古本《竹书纪年》,证以先秦他书,用以订正《史记》的伪误,考证诸子年世。每证一子,举凡其余诸子行事、他类文献记载、六国政治古实,乃至山川地理等,均核准无误,构成其严密精深的战国史研究系统。这本书堪称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以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为战国史

和诸子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成为时人谈论“百家之学”的依据之一。

除钱穆以外,在辨伪与考年论世的热潮中,陈柱、吕思勉、刘汝霖、罗根泽、郎擎宵、王遽常、蒋伯潜等人的诸子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的观念与严肃客观的学术研究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疑古派在作出他们成绩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有文献价值的先秦古籍,如《文子》、《鹖冠子》、《晏子春秋》等长期受到冷落。辨伪风气的盛行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五四时期,诸子学风行一时,除了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提倡之外,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五四时代人人追求个性发展,而百家争鸣的诸子无疑是极有个性的,所以人们对那个充满活力的先秦时代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众多关注着诸子思想研究的学者中,这一倾向在郭沫若身上显得尤为突出。郭沫若受泛神论观点的影响,而且重视个性解放,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中,他往往会在周秦寻找与那些西方天才相契的代表,如1935年发表的《论中德文化书》中认为,老子与尼采同样反对有神论,康德与孔子均为“球形发展的天才”等。而20世纪40年代的郭沫若,作为较早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学者之一,基本上把子学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与史学相结合的伦理政治思想的探讨上,对思想解放与否的评价标准也是进步与否,这在他“是儒非墨”的观点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一时期他的子学研究代表作是《十批判书》(重庆1945年初版)。他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从3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论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导,阶级分析理论也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于是他从社会历史入手,结合阶级属性来考察各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子学研究的主流方向。这段时间出版了多部思想史著作,有杨鸿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版)、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海文风书局1946年版)等。侯外庐与杜玄冰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上海新知1947年版)、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三联书